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

——白宫岁月(上)

受 命 变 革

(1953—1956 年)

—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890—1969）写的回忆录。艾森豪威尔是美国西点军校出身的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北非盟军总司令、西欧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指挥过盟军在北非、地中海战区和欧洲大陆进行的几次重要战役。战后曾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军司令、美国陆军参谋长。1948年退出现役，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年复出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他作为一个从欧洲战场凯旋归来的五星上将，当时声望很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想利用他这块牌子，竞相拉拢他出任本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经过几年斟酌观望，最后决定充任195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在1952年和1956年两次当选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共和党中的保守派，在本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担任总统时期的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在战后逐步走下坡路的过程，可作为研究国际政治和美国现代史的参考资料。原书根据总统任期分成两部，第一部名为《受命变革》，第二部名为《缔造和平》，总名《白宫岁月》，时间从1953年到1961年。因原书篇幅较大，中译本把每部分装成两册，共四册。全书正文除《受命变革》的第十一章《在白宫的生活》因参考价值不大未译外，其余全部译出。对原书附录也根据其参考价值作了取舍。有关的地图系根据原书所附地图复制，附在每部的第二册后。

目 次

第 一 卷

第一章 跨入政界的序幕..... 3

最先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建议。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年代里。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建立。亨利·卡
伯特·洛奇的来访。“艾森豪威尔公民助选团”运动的兴起。
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政治立场的宣布。预选及作者返美。

第二章 候选人.....31

从历届政府首脑所了解到的情况影响我对总统职位的态度。
民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堪萨斯州阿比林所作的第一次竞选演
说：对国内各种危机的看法。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
的会晤。在芝加哥，党代表大会关于得克萨斯、佐治亚及路
易斯安那各州的决议：草拟竞选纲领，总统候选人选举的投
票。作者访问塔夫脱。挑选尼克松。接受提名演说。

第三章 竞选运动——火车和飞机.....59

家庭重聚。在丹佛的战略会议。在爱达荷州博伊西所作的关
于“走中间道路”的演说。为竞选活动所作的短暂停留：在火
车和汽车队中以及越过南方时的竞选生活。与塔夫脱在纽约
的会晤。关于尼克松基金问题。宣布去朝鲜的打算。在波士
顿的最后一次演说。大选之夜。

第四章 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内阁的组成,访朝使命.....9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势,西欧的重建,共产主义的扩散,中国大陆的沦陷。行政变革:与杜鲁门总统的会晤,挑选白宫工作班子和内阁成员。秘密访朝视察战况,并与司令官们和李总统会谈。一系列的会晤:与丘吉尔,在康摩多饭店与新的内阁成员。总统就职典礼。

第 二 卷

第五章 新职务、新面貌 127

在白宫的最初一些日子里。查尔斯·威尔逊的任命最后被批准。任命权和“利害冲突”问题。总统办公机构的有效改组;和新闻团体间的联系;一个新的预算。国情咨文。关于物价管制问题的斗争。防务设施的复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建立。

第六章 北约、苏伊士运河、伊朗、印度支那的

麻烦..... 164

在作者 1951 年的旅行中,苏联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宣传活动的失败。杜勒斯和史塔生作为总统特使被派往欧洲各国首都。作者和斯大林的早期会晤。俄国的新领导。“呼吁和平”的演说。米尔顿·S·艾森豪威尔博士对与拉丁美洲关系的研究。英国在苏伊士基地问题上和纳吉布的谈判。伊朗石油工业被没收。摩萨台王朝的垮台。与越南军队建立军事联系。

第七章 朝鲜:流血的结束 203

冲突历史的回顾;联合国关于保证稳定局面的决议;地面防御战的战略;在三八线的行动;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威胁。“屠

杀战”。美国和韩国部队的扩展以及进行核战争可能性的考虑。板门店停战谈判陷于僵局。“小小转机”。李承晚强烈要求朝鲜的人为分裂局面必须结束。恢复谈判,交换战俘。二万五千名战俘“逃跑了”。当共产党继续进攻期间,沃尔特·罗伯逊和李承晚保持合作。停战协定签字。

第八章 竞选纲领,应信守的诺言 224

要排除的障碍: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微弱多数,根深蒂固的对抗情绪,哲学观点的分歧。维护竞选纲领的意图。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复查。德尔金部长辞职。邮政部的赤字。减税的时限问题。近海石油问题。国际贸易协定。查尔斯·波伦的提名受到反对。企图限制政府首脑在对外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时期移民立法。和塔夫脱参议员的紧密合作,因其死亡而终止。

第九章 早期的几个决定 262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案件。最高法院的判决。作者作出决定的推理。共产党报纸和同情的公民的指责。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示威。首席法官文森之死以及沃伦州长的任命。选择的标准。在武装部队中和哥伦比亚特区取消种族隔离。加强共和党的决定。举行记者招待会。

第十章 与丘吉尔和拉尼埃在百慕大——和平利用原子能... 279

巴拿马总统雷蒙的来美访问。在法尔孔水坝:作为总统第一次越过美国边界访问。与墨西哥、加拿大的关系。百慕大会议。法国不愿批准欧洲防务集团。丘吉尔为英国对苏伊士基地所采取的行动辩护;提醒注意未成熟的自治。建议召开十二月会议。与丘吉尔重叙旧谊。在联合国大会所作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说。

第一卷

当我们的灵魂唤起我们的力量后，我们的智慧必须去指引它。

在国际事务中，在好战地主张使用武力和怯懦地承认无所作为之间奉行一条不可动摇的路线。

在国内事务中，存在着一条在不受束缚的个人自由和全民福利的需要之间的折衷路线。这条路线必须谨慎地使政府摆脱官僚主义，同时注意切莫对无依无靠的平民置之不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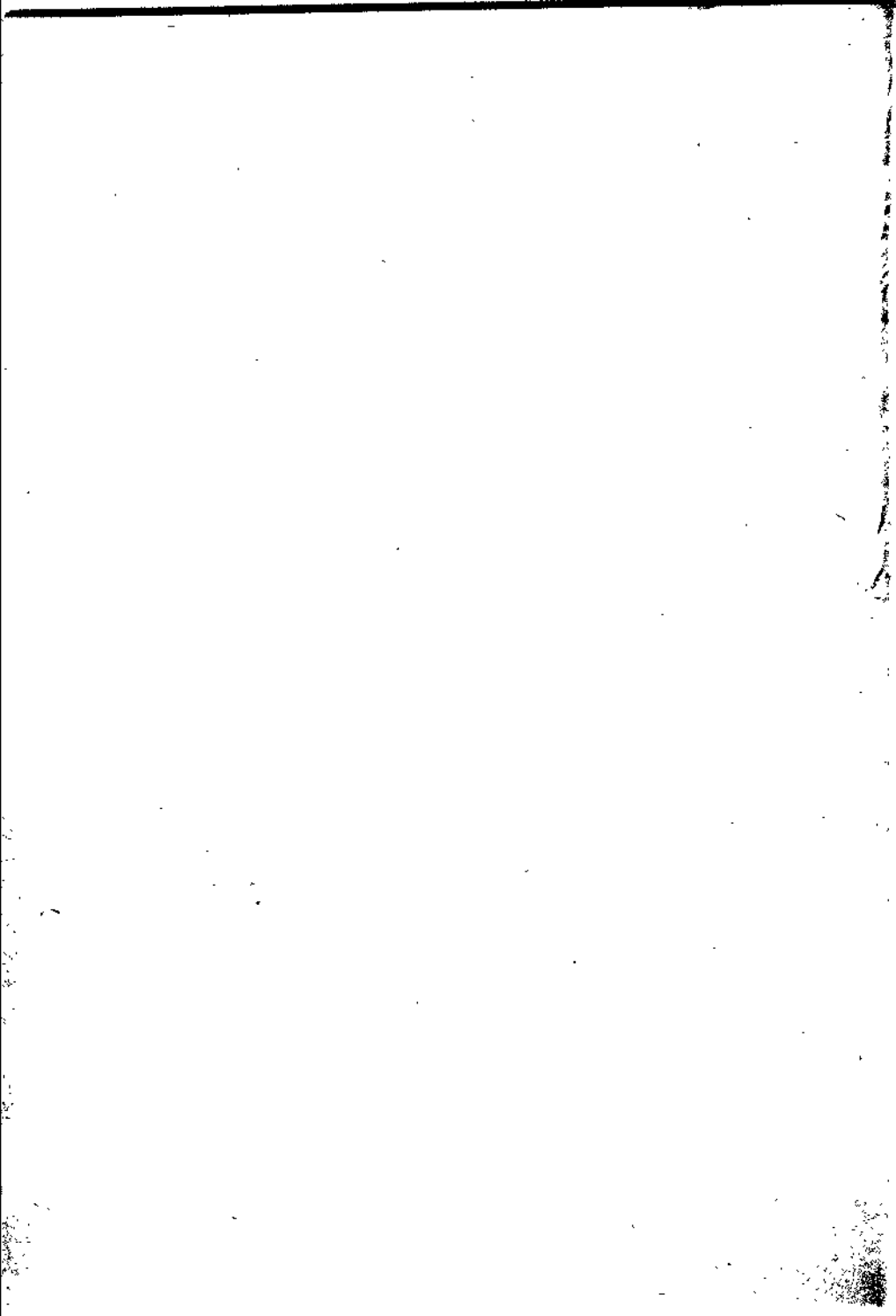
在政治活动的各个领域，自由的人们要期望取得胜利，事先必须深思熟虑。

我们必须以这种精神对待生活和工作；对我们的力量充满自信，富于同情心，头脑保持清醒。

让我们以这种精神共同肩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

——国情咨文

1953年2月2日



第一章

跨入政界的序幕

当一个人接受了公众的委托时，他就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公众的财产。

——托马斯·杰斐逊

1953年1月20日，我站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东正厅平台上，在首席法官弗雷德·M·文森的主持下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一项我要担任八年的职务。

那几年是事关重大的年头，向新政府挑战的问题是复杂而逼人的。在东亚激烈地进行着两场战争，其中一场战争美国是深深卷入的，另一场战争也和美国生死攸关，伊朗看来几乎要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没有找到积极的办法来调动西德的潜力以纳入它的防务；赤色中国似乎日益倾向于用武力来扩展其疆界；奥地利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而这是苏联的不妥协态度使然的。欧洲各国的经济还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恢复过来。共产主义力图通过控制危地马拉，在美洲建立第一座桥头堡。

在国内，我们面对着庞大而持续不断的赤字，我们的货币迅速贬值，企业间的倾轧盛行一时，经济在工资和物价的管制下弄得很困难，税收已经超过了人民的负担。我们的信心也在日益消失。美国人在忠诚、政府中的共产主义分子以及高级官员营私舞弊等问

题上产生了分歧。

我们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能把它们说成全是黑的或全是白的。那些年月的许多成就给我——也常常给国家——带来满足，而一些失败则带来失望。

那几年是繁荣昌盛的年代。尽管有一次轻度的和一次急剧的经济衰退，但国家的收入和生产率还是显著提高了；财政上的责任心不断地加强了；对国内安全问题的各种分歧已经消除；已经发生的战争停止了，一些可能爆发的战争在发动之前就被制止了。虽然莫斯科和北平的侵略意图仍未改变，但滚滚向前的共产主义终于停了下来。

科学方面的巨大发展对和平事业和战争武器都作出了贡献，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就和平事业而言，这种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而战争武器却无限制地增加了我们的负担。

对我来说，那些岁月是令人振奋的——即使有时老一套的例行公事变得令人厌烦。那些岁月给我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悲痛——置身于新友旧谊中，我感到欣喜，对至亲好友和受人尊敬的同事的去世则感到悲痛。最重要的是，那些岁月给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暖人心房的信件（和来访者），它们来自城市、农场和乡村，有的是对我鼓励，有的是表示忠诚，甚至当这些写信的人觉得有必要对我提出批评时，也是如此。

美国人民给予我这千金难买的、无上的光荣，使我在总统职位上为他们服务。在这本书中，我将尽我所能地叙述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 * *

就我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说，1943年，弗吉尔·平克利最先认真地提出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总统候选人。那还是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平克利当时是北非战区的一个新闻记者，他在盟国对北非轴心国军队进行了扫荡，并越过西西里岛，在意大利登陆，终于在地中海取得胜利后不久来访问我。在这些军事行动的最后阶段，所有盟军归我全面指挥，由于这些军事行动的胜利，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被赶下了台。

在评述这些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时，平克利先生说，从几乎已成为一种美国的传统惯例来看，作为一个庞大而又获得胜利的军团的战时指挥官，我必然会被认为有当选总统的极大可能。

的确，在美国历史上有很多事例证实了平克利的论点，即战场上指挥的胜利往往会导致后来政治上的考虑：乔治·华盛顿、安德鲁·杰克逊、威廉·亨利·哈里森、扎卡里·泰勒以及尤利塞斯·S·格兰特，虽不完全是，但基本上是由于他们的战功而被选为总统的。乔治·B·麦克莱伦和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也许是波托马克军团中最负盛名的两位将军，他们都曾被民主党提名，虽然没有当选。近代，这种倾向已不大明显了，尽管伦纳德·伍德和约翰·J·珀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获得广泛的支持而担任政界职务。

虽然如此，如果说平克利的建议使我大吃一惊的话，这决不是过甚其词；我当场的反应是，他有点象在开玩笑。

“弗吉尔，”我说，“你昏了头了。”

在艰巨的战役中，一个指挥官不相信在他面前还有什么比赢得胜利更为重要的事情，他变得如此全神贯注于战术问题和战略计划——事实上，他把全部精力放在赢得胜利上面——以致他对要他操心份外之事的建议都只能作出否定的反应。这的确就是我的当时的感觉。我认为把我的名字和总统职位相提并论完全是荒诞不经的。但平克利先生依然笑嘻嘻地提醒我注意我那相当激烈的语气和多少有点矫饰的否定态度。

从那时起,类似的建议不时引起我的注意^①,但以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出于自卫地置之一笑,直到1945年欧洲停战后,有一天,杜鲁门总统同布莱德雷将军和我在柏林同坐一辆车时,杜鲁门总统突然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得到我所要的一切,包括1948年的总统职位^②。这样就把事情搞得更严重了,但是我马上回答说,我在感谢他的美意的同时,无论如何没有野心踏上政治这条路,我也不会去考虑谋求一个政治职务的可能性。我还说在我一生中再不会有比在1945年5月7日看到希特勒的残余部队在法国的兰斯向盟军投降更使我个人感到心满意足的時刻了。我为盟军和他们的丰功伟绩以及由于他们采用的战略、战术计划取得的重大胜利而感到骄傲,这些战略、战术计划是在受到某些方面的长期反对中发展起来的。

在那次谈话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对有关我个人政治前途的各种可能性提出的询问作出不单单是诙谐地应付一通的回答。

几个月以后,在1945年末,我奉命回国并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当我去白宫报到时,我让总统知道我想要退役,但是对他的决定中所包含的给予我的荣誉我自然表示感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陆军参谋长这一职位由于我的年龄的限制、提升的难以预测和退役法等因素,对我来说可能完全是不可企及的,虽然在当

^① 在战时,其他人也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堪萨斯州的参议员阿瑟·卡珀,曾在1944年,后来又在1948年,赞成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纽约城美国荣誉军团坦克部队分会在1943年提名过;乔治·艾伦在同年写信问我:“对当一个总统候选人有何感想?”我给他的回答是“胡扯!”

^② “总统的这个建议显然是真诚的,而且确实是令人震惊的,我不相信国内有哪个人心灵曾受到过一位总统如此突然的冲击。……遇到总统这种突然向我射来的鞭炮,我除了把它当作一个绝妙的玩笑外(但愿如此),实在无法招架,我不胜感激地笑着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是您竞选总统的对手,但不会是我。’毫无疑问,我的态度是认真的”。——《远征欧洲》,1948年版,第444页。

时看来，这个职位是引人注目和令人感兴趣的。而在1945年，在希特勒覆灭之后仅仅几个月我回到美国，在度过了惊心动魄的、戏剧性的和有着无穷忧虑的战争岁月之后，要我来负责令人厌烦的陆军复员工作——特别是据我看来，在这样一种仓促而几乎是慌慌张张的基础上进行单方面裁军是不明智的——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令人厌恶的。但是，对总统要我担任参谋长之职直到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能卸掉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职务时为止的这个建议，我的回答是我准备在他所希望的任何时候到职。根据这点，总统认为我大约会担任两年时间。在此期间，我要求退役的希望虽未破灭，却因而推迟了。1945年12月，我接替了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职务^①。

没有多久，政治当真地把我的生活开始卷进去了。在华盛顿，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成为一大群爱好追根究底的记者的目标。尽管我一再否认我抱有政治野心，但他们对我未来计划的好奇心仍有增无减。因为只有通情达理才能尊重别人的善意，所以如果说这种经历对我完全无动于衷，那是蠢话。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些问题同我毫不相干，这些建议是不切实际的，这既由于我对政治生涯缺乏雄心大志，又由于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几乎和一切政治活动相隔绝。

可是，这类问题在好几个月中与日俱增，这种事情变得令人厌烦起来。我决心断然把它制止。我的幽默感开始显出消磨殆尽的迹象。

在新罕布什尔州1948年预选提名的预定日期前不久，该州的

^① 我原来认为只有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和我知道这一项新的任命。但在总统宣布任命的前几天，当我去衣阿华州邦尼市看望我的叔父乔尔时，我听到一位评论员在无线电里透露了这个消息。此事是发生在华盛顿，所以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保密地方啊！”。

一位报纸发行人伦纳德·V·芬德尔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竭力劝说我同意把我的名字列入当地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中。由于获得这么一个极好的机会来阐明我的立场，我草拟了一封公开的复信。我希望这封信对有关我个人心愿的每一个正当的问题都能给予回答，并有力地答复那样一些人，他们断言我“愿接受提名”是对美国人民的无可推诿的责任。在这封信里我强调说，在我看来，如果自以为有为数众多的人希望我成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就有点厚颜无耻的味道了；我解释说，措辞之难在于既要干脆地表示拒绝，同时又要不要“对为国尽责的概念显得有所漠犯，这种概念号召每一个正直的公民准备无条件地在任何指定的职位上服务。”接着我重申了我的信念，“军政之间必要的和明智的从属关系应尽量保持不变……终身的职业军人如果没有某种明显的、充份的理由，应力戒追求政治上的高级职位。……”

我表示，我以前“过于单纯地相信直截了当拒绝的效果”，如果因此而使人们为我费时耗力的话，我感到抱歉，我最后说：

总之，我明确而肯定的决心是完全脱离政治舞台。我知道你不会反对我用这封信公开告诉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即使出现我被正式提名这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下我也不愿接受。

这封信的发表有效地使大多数政治流言和评论暂时平息了下来，我为自己的明智行动感到庆幸。

1948年2月，我把参谋长职务移交给了布莱德雷将军，而在此之前几个月我被告知他不久就能离开退伍军人管理局。我马上开始享受退役前的最后一次假期，并于1948年春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校长。

不久，许多人开始认为我由军界转入教育界会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文职官员，因此，我早先在1月间致新罕布什尔州的信中列举的理由就不再有效了。

他们一厢情愿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按照特殊的法令，我和其他人一样是一个陆军将领，从理论上来说，这是终身的职务。尽管我没有具体的军职，但这种身份给与我和其他同级军官一样的薪金、津贴和许多同样的特权；它也受到同样的约束，这种约束——至少在我看来——排除了参加政党活动的可能。不仅如此，尽管我现在身穿便服，从事文职工作，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直到那时为止，我的整个成年时期都奉献给了军务。

然而，所有这些情况都被许多非常固执的诘问者和毛遂自荐的顾问所忽视。我对那些仍然试图使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的人们继续置之不理。

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不关心国家大事，包括那些带有显著政治色彩的事件。的确，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安，那就是在我国人民中，特别是在青年人中，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责范围；而在个人方面，艰苦的工作已经不再是改善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关键了。在一次偶然的公开谈话中，我坚决反对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不管我们收入多少，在我们一生中大家都应该吃鱼子酱，喝香槟酒，而实际上吃红肠面包和喝啤酒却会更合适些。使我感到有趣的是，这种朴实的意见，竟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的一篇社论中受到了严厉的指责。

但是，联邦政府搞家长式统治的趋势，并不是使我感到困惑的唯一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众所要求的——而我们领导也同意的——美国武装部队迅速复员的狂热，预示着可能出现一股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孤立主义新浪潮。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屈服于我们传统的孤立主义信念——这多半是由于苏联仍然阴谋主宰世界——但我们仍然在拼命地裁军。现在有很多人还不

懂得，如果没有实力，我们既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会在世界会议上受到尊敬。虽然我们采取了象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这些必要的措施，并且继续支持联合国，但我们也让我们的军事防御力量降低到了远远不足的水平。战后，我们大大削减军事人员是政府决定把美国占领军从朝鲜撤出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对这些问题的感受早就使我确信，对我来说，奉行一种应贴上“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诸如此类标签的狭隘的政治哲学是不可能的。我认识到了（至今仍然如此），一个人考虑和决定任何问题，只能以他那种致力于实现他谋求进步的哲学体系为依据，即永远从他认为有利于整个美国这个观点出发。至于那些权威的评论家们爱贴什么标签，就让他们去贴吧。

我又开始收到具有政治头脑的人们的大量来信——其数量之大，有时使大学的邮政设施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一件事竟使我的私人办事人员喧嚷起来。在我到大学后不久，电台评论员沃尔特·温切尔要求每个听众寄一张名片或一封信敦促我争取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邮件数量很快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第一个星期里，几乎有两万件信件，名片和电报——在可能处理这些信件之前，哥伦比亚大学连存放它们的适当地方也没有。对于我们的劳累过度的办事人员所受的委屈，我倒并不十分感到担忧。我相信一旦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完并结束工作后，这股浪潮肯定会停止下来。因此对于我的助手们碰到的难题，我觉得有趣，也有点同情。在第一天结束时，我建议不妨连我的宽敞的办公室也用来存放信件，直到把一包包信件整理和处理好时为止。

当第二天早晨我到办公室时，我的办事人员采取了报复措施，我连坐着办公的余地几乎都没有了。要工作是不可能了，而且，显而易见，我已无法接待客人。我马上宣布了一个新的计划：我打算出外度假，直到他们能向我报告这个地方已经腾出为止。但是接

连几天，都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那些源源而来的信件，而我的助手们甚至连计算那些如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和名片的数目都感到困难。最后，对研究群众心理反应感到兴趣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前来援助并接替了大量涌来的信件的分析工作。援军来后，我的助手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便通知我可以返回我的办公室了。

1948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比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得早。6月下旬当共和党代表在费城开会时，事情变得很明显，杜威州长可能会被提名。在即将进行提名的前几天，代表大会中一些知名的共和党人开始用信件、电话和亲自打来电报同我联系，他们说我应该参加阻止那个他们所谓的“不能当选”的人被提名的政治斗争。除了一位挚友威廉·鲁滨逊外——他是被费城当地那些认为杜威不能当选的人闹着来送信的——我拒绝会见任何人，拒绝接任何电话或答复来自该城的任何电报或信件。我只是声明，在1月23日致新罕布什尔州的信中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它仍然表明我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在杜威州长的提名问题上，攻击意外地改变了方向。许多民主党人断定我寄给伦纳德·芬德尔关于我拒绝进入政界的信仅仅适用于共和党；他们显然认为就他们而言，我的答复就不同了。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7月中旬召开时，我又被卷进信件、电话和来访者的新的冲击之中。很清楚，有必要再一次发表公开声明。我把大学公共关系部主任罗伯特·哈伦请来，给了他一封信，要他立即向报界分发。在这封信中我重申留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决心，最后我说：“我……不能接受任何公职的提名或者参加党派的政治斗争。”

这样就解决了1948年总统选举的难关。直到那年11月为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记挂在心上。但是几乎就在杜鲁门击败杜

威后几小时内，这个过程又开始重演，这时人们的主张是：我应争取 1952 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在这个问题上重新进行搏斗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信中明确地肯定要我和军界继续保持关系；总统和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要求我不时地回华盛顿担任非正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样一个职位当时还没有通过法律授权，但是总统的私人军事助理威廉·莱希海军上将在战时以及战争刚结束的日子里曾担任过类似这样的职务。现在，这位海军上将由于年迈而不大活动，总统因此要求我出来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众所周知我认为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我赞成各军事部门的有效统一和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防部的观点——那时，这些观点在军人之间还远非一致。这一外加的任命对于降低我在未来的打算中对政治的兴趣似乎起了显著作用。

我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两年半中，工作上感到满意的，个人方面也极为愉快。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在他的校董会中比我在哥伦比亚校董会中享有更诚挚的合作关系，其中我的知己朋友托马斯·沃森是劝我担任大学校长职务的一个关键人物。我在大学校长任期内，不仅对教育、财政和“公共关系”方面深感兴趣，而且还协助制订一些新的计划，其中包括全美议事会（一种经常把企业家、劳工、各行各业人士、各个党派和政府官员聚集在一起研究全国性问题的会议活动），保护人类资源规划以及和平讲座等。这些大胆的尝试和日常职务，使我既忙于办公室的工作，又奔波于整个美国。我的妻子和我对这种新的生涯是感到高兴的。

我的部分职务使得我抛头露面。我在 1949 年所作的一项声明，后来具有重大意义。那一年，我接受了美国律师协会的邀请，